



① Michael O' Sullivan, *The Levelling: What's Next After Globalization*,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9.

② Eswar Prasad, "The World Will Regret Its Retreat From Globalization,"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03/24/trade-economy-globalization-united-states-china-ira-chips-reshoring-decoupling-industry-china/>, March 24, 2023.

③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Goeconomic Fragmentation and the Future of Multilateralism," <https://www.elibrary.imf.org/view/journals/006/2023/001/006.2023.issue-001-en.xml?Tabs=contentsummary-102775>.

④ Ian Bremner, "Globalization Isn't Dead: The World Is More Fragmented, but Interdependence Still Rules,"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world/globalization-isnt-dead>, October 25, 2022.

如果浏览有关全球化的新近研究，很快就会发现诸多“全球化已死”的断言。在迈克尔·奥沙利文（Michael O' Sullivan）看来，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新的转折点，其在影响范围和重要性上与冷战结束的后果相似。^①奥沙利文的关注重点在



于如何应对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均衡性，比如不平等问题——最明显的就是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大规模不平等，以及当前全球机构在纠正这些不平等方面的无能。此外，埃萨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补充道：“2008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各种地缘政治动荡”，正在促使许多国家寻求“退出全球化，内顾倾向也越发明显”。^②还有观点甚至认为，全球化即将被“地缘经济碎片化”（goeconomic fragmentation）所取代。^③

哪里有激烈的观点，哪里就有激烈的反对意见。在全球化的健康发展和命运前途问题上也是这样。尽管如此，大多数认为全球化还远未结束的人都承认，未来不太可能像过去那样。伊恩·布雷纳（Ian Bremner）指出，正如“超级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在全球危机之后让位于一种新形式的全球化一样，我们正在走向另一个新阶段。在这个时期，由于地缘政治竞争，一些国家之间的金融和贸易流动确实可能会减少，但这并不意

全球化已死？

——反思全球化的关键问题

肖恩·布雷斯林，英国华威大学教授

味着全球化的经济相互依存会终结。^④

在欧洲，第二种宣称进入新时期的想法似乎反映了主流观点。冒着过于简单化的风险，我们可以找出三个主要理由，来佐证此前的全球化经济网络模式已经出现转向。首先，权力已经从民族国家扩散到其他地方，国家权威需要恢复。这种感觉在现实中经常表现为呼吁加强国家边界，以反对移民或抵制权力从民族国家转移到欧盟，确保国家对自身经济命运的更大控制。其次，是对经济安全的担忧。当一个国家越是依赖从全球贸易中获得自己想要的资源，并出售自己生产的产品，那么它就越有可能遭受这种流动中断带来的影响。最后，是国家安全方面的争论。人们担心可能存在的操纵全球化的经济关系，以此获得政治权力，实现地缘政治目标。对经济治国方略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地缘经济学重新燃起兴趣，即是这种忧虑的表现。然而，考虑到全球网络关系的连接广度和嵌入深度，打破它们已经变得非常困难，并且打破之后可能破坏稳定。同时，由于非国家经济行为体在塑造全球经济流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也意味着政府无法单独完成任何尝试改变这些流动的行为。

全球化、国家与市场

正如保罗·詹姆斯（Paul James）和曼弗雷德·斯蒂格（Manfred Steger）在研究全球化的演变过程时指出的那样，确定一个新概念何时诞生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们或许认为自己已经确定了最早的用法，但后来却往往又能找到更早的用法。然后是主体间意义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同的学科背景下，同一个词、术语或短语往往有着不同的内涵。话虽如

此，但平心而论，现代关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才真正兴起。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流行，则成为推动当时有关全球化的学术研究和大众兴趣的驱动力。

苏珊·斯特兰奇 (Susan Strange) 是研究全球化这一维度的主要学者之一。在 12 年的时间里，她出版了四本有影响力的著作，并且都在不同程度上关注非国家经济行为体 (相对于国家的权力) 引导和控制货物、资源和资金跨国流动的权力。^①在她去世 (1998 年) 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她对国家和市场行为体之间权力平衡的见解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时的全球政治和国际经济，而且对今天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仍然非常有意义。

斯特兰奇认为，跨国公司权力的增长并非偶然。它的发生是因为新自由主义政府——尤其是美国和英国——希望它发生，并相应地放松了对经济的管制。然而，一旦他们这样做了，所有的政府都会发现越来越难以控制自己的经济命运，即使是那些一开始就推进全球化传播的国家。^②一些改变就业、利率、汇率等的关键性决策，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公司董事会的影响。因为主要公司决定了在哪里生产什么产品，而对冲基金经理希望寻求更大的投资回报。此外，当许多政府试图增加本国经济对国际流动资本的吸引力时，他们改变财政制度的方式又往往会对政府在社会安全网络上的支出产生影响。虽然不太可能准确计算出在任何一个国家内部全球化 (或仅仅是全球化本身) 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不平等，但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而进行的生产全球化，显然会使一些人比其他人受益更多。

因此，今天与全球化相关的一些不安全感实则源于 20 世纪新自由主义偏好和政策的传播。不过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另外两个关键问题对于塑造当代全球化辩论同样至关重要。

全球化与经济问题

首先是全球金融危机。这场危机的直接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对欧洲而言，除了对个人造成非常现实

的后果，它也影响到了欧盟内部的凝聚力。并且，这不仅仅是一场发生在过去的危机。许多政府为防止更严重的直接后果而采取的应急措施同样产生了高昂代价。直至今日，许多国家仍能感受到为应对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衰退所付出的代价。这段 2019 年对欧洲遭遇持续挑战的评估在今天看来仍然适用：“一些成员国出现长期的宏观经济失衡和高额的公共赤字，以及主权国家和银行业间持续存在的恶性循环风险。危机后的脆弱性还包括加剧的不平等、青年失业和高在贫困风险。”

尽管当时人们对银行纾困政策存在许多抱怨和抗议，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受紧缩措施影响的人们随之而来的沮丧情绪却并不总是针对“全球化”本身。在这种情况下，非国家行为体首先出现了危机。正如托马斯·弗莱厄蒂 (Thomas M. Flaherty) 和罗纳德·罗戈夫斯基 (Ronald Rogowski) 所指出的，政党经常将生产全球化的后果与其他问题捆绑在一起，从而利用由此产生的不满。^③其中，移民是一个共同关注的焦点议题，它不仅可以对公众的工资、获得健康教育和福利产生影响，而且也会导致一种相当模糊的情绪，即民族性 (无论它可能是什么) 正在被破坏。不满情绪中常常也有反精英的成分，有观点即认为，国内本土社区和声音正在被忽视。有时还有一种更极端的观点，认为“全球化精英”根本不关心所在的这个国家。^④

从本质上讲，上文提到的第一波全球化浪潮所引起的关切是建立在随后的全球化危机后果之上并因其而加剧的。这种关切当前正不断产生威胁，也即导致曼纽尔·卡斯特 (Manuel Castells) 所说的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决裂”，其最终不仅会破坏新自由主义经济计划，而且可能损害自由民主体制本身。

① 也许说三部半更准确，因为最后一部在很多方面都是对第一部的更新。

② Susan Strange, *The Retreat of the State: 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44-45.

③ Thomas M. Flaherty and Ronald Rogowski, “Rising Inequality As a Threat to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5, no. 2, 2021, pp. 495-523.

④ Manfred Steger and Paul James, *Globalization Matters: Engaging the Global in Unsettled Tim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187-208.



资料图

主题为“重建信任”的世界经济论坛 2024 年年会。资

料来源：新华社

危机可能导致人们对全球供应链中短缺商品的迫切需求，并因传染疾病等事件而出现供应中断。政治动荡和战争可能会导致生产停止和贸易中断，从而给全球消费者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

然而，正是蓄意破坏行动的可能性吸引了一些政治家的政治想象力。长期以来，通过国家干预来支持和促进国家内部行为体并使其在全球经济中获得优势，一直是全球化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关键议题。世界贸易组织多年来的工作以及各国采取的双边行动均反映了其重要性。这方面的案例，包括特朗普对来自中国的某些进口产品征收关税，以及欧盟实现与中国“互惠”的战略目标，即欧洲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与中国公司传统上进入欧洲市场的机会相同。

人们的认识已然改变，即国家不仅试图为其公司获得商业优势，而且还寻求利用经济杠杆来实现政治战略目标。亨利·法雷尔（Henry Farrell）和亚伯拉罕·纽曼（Abraham Newman）提出的“武器化相互依赖”（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概念就体现了这种担忧。^①这一概念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权力并非均匀地分布在网络的所有部分，一些国家的某些参与者占据着关键地位。这种权力不对称不仅使东道国有能力对本国公司施加影响，以帮助它们从其他国家那里获取在政治方面的可用数据，而且还可以扰乱商品和资源的正常流动，以惩罚或约束潜在敌人并奖励盟友。法雷尔和纽曼指出，几十年来，各国出于政治原因一直在利用不对称优势。他们还指出，只有美国、欧盟等少数国家和地区在足够多的不同网络中拥有足够多的关键枢纽，可以为他们提供武器化行动的基础。

① Henry Farrell and Abraham Newman,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 How Global Economic Networks Shape State Coerc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4, no. 1, 2019, pp. 42–79.

在 2016 年脱欧公投中，那些希望英国脱离欧盟的人喊出的“收回控制权”口号，目标就是夺回据说已经被欧盟夺走的国家命运控制权。这一口号抓住了许多人对更安全的经济未来的共同愿望，而这通常与一种想法联系在一起：要在事情变得更糟之前在某种程度上回到以前的“黄金时代”。因此，在英国出现了“收回”控制权的思潮，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的美国，出现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想法。这些情绪除了有助于世界各地一些民粹主义政党的选举成功外，还导致许多国家更广泛地呼吁加强国家干预，以保护国民经济免受外部经济利益和力量的影响。

全球化和不安全

第二个主要问题是，生产全球化使各国容易受到关键商品和资源供应中断的影响，这种破坏并不总是有意为之。自然灾害，甚至是在通过一些国际交通要道关键节点时糟糕的航海技术（如苏伊士运河堵塞的情况）都可能导致延误或取消。意想不到的

全球化的未来

那么，这一切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一方面，正如全球金融危机所显示的那样，全球化的失败给许多国家的国内政治蒙上了阴影。此外，应对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成本进一步提高了这场危机的财政和其他经济成本。这导致的部分后果是，旨在“夺回控制

权”的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思潮获得更多支持。另一方面，人们越来越担心全球化网络可能被政治化和武器化。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一度被视为不仅是通往繁荣的道路，也是通往和平与安全的道路，但现在却日益被视为不安全的主要来源，因为它可能被寻求实现地缘战略目标的国家所捕获和控制。

全球化已成为安全问题，俄乌冲突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当前和未来的能源安全上，以及曾经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关系能以何种速度发生变化。虽然俄罗斯是一个重要的能源供应国，但对欧洲经济体而言，在广泛的各个领域中，它的重要性远不及中国。在经常重复的表述中，俄罗斯被视为风暴，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事实上，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使各国似乎更关注与中国经济相互依存的长期影响，而不是与俄罗斯本身的关系。

没有中国的全球化真的可行吗？虽然有一些人呼吁朝这个方向发展，但无法想象，在不给相关各方造成重大经济影响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如何发生。值得注意的是，在欧洲，与中国“脱钩”的说法如今已基本没有市场。欧盟所谓的目标是消除那些可能导致被利用的脆弱的经济联系，同时保持那些没有问题的关系。欧盟确定了四个需要优先保护的关键技术领域，这也指明了当下迫切需要注意的领域，即先进半导体技术、人工智能技术、量子技术和生物技术。

识别风险与解决风险是两回事。如果我们回到在本文开头概述的斯特兰奇的观点，企业做出的许多决定塑造了全球化的网络。那么，如果要发生脱钩，企业也将要做出许多新的决定。显然，政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非国家行为体的行为。例如，国家可以立法禁止某些部门的投资，或禁止特定商品和日用品的贸易，或设置其他贸易壁垒，使其在经济上没有吸引力（这种情况也发生过）。政府也可以通过立法保护国内生产商免受来自成本更低的外部竞争对手的竞争，投资于国内产能，并提供其他形式的激励措施，鼓励企业将生产能力从不值得信赖的地方“回流”（回到国内）或前往“友岸”（流向值得信赖的盟友）。问题在于，如果在经济上没有意义，有多少公司会把国家安全逻辑置于企业商业逻辑之上呢？

所有这些解决方案都有成本。要么是政府的成本（最终是纳税人的成本），要么是消费者的成本（以更高价格的形式），更常见的是双方都要付出代价。考虑到长期应对全球危机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后许多国家的财政状况，其中一些国家在是否有足够资金来做出重大转变方面必然有严重问题。

事实上，整个欧洲存在着相当大的多样性，并不存在一种单一的立场、观点或看法。在单个欧洲国家内部，也经常存在相当两极分化的争论。尽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对全球化和现状的批评来自不同的方向，原因也大为不同。此外，全球化带来的潜在安全挑战无疑比以往更加引人关注。就在不久之前，许多欧洲国家还在竞相成为中国最好的朋友，而不是试图找到降低双方关系风险的方法。如果说人们一致认为必须改变现状，那可能言过其实了。但有一点似乎很清楚，即这一看法肯定在许多国家都有众多追随者。目前尚不太清楚的是，如何在不产生其他问题的情况下解开现有的结构关系。

翻译：徐信高，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校对：顾嘉伟，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